

馮定文集

冯 定 文 集

第 二 卷

人 民 出 版 社

冯 定 文 集

FENG DING WENJI

第 二 卷

《冯定文集》编辑组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25印张 384,000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660

ISBN 7-01-000322-X/B·29 定价 10.50元

目 录

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 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	1
一面旗帜——毛泽东思想	32
修养无时可息 学习终生不停	43
论中国工人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 的基本特点	53
谈“百家争鸣”	90
关于我国当前阶级矛盾的性质和斗争的形式问题	93
关于中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质和斗 争形式论争的关键	116
共产主义人生观	145
爱养父母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是必要的美德	203
中国在过渡时期的辩证发展	209
个人主义与个人利益	228
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	243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伟大胜利 ——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几点初步体会	251
关于“红专”	268
革命的人生是不朽的 ——学习雷锋的关键	287

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295
生命的价值	
——谈谈革命人生观	302
立足今天 懂得昨天 奔向共产主义明天	307
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 走历史的必由之路	313
人活着究竟为什么?	329
学习少奇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	33
青年的苦闷从何而来?	346
吸取人类思想文化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兼谈研究外国哲学的态度和方法	350
让共产主义道德深入人心是理论工作者	
的神圣职责	358
列宁对我们今天的启示	373
怎样学哲学	381
纪念鲁迅 振兴我们的精神世界	388
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特殊的	
重要地位和作用	392
人生漫谈	396
探索探索者的道路 开辟未来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研究谈一点意见	510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送到人民手中	
——论哲学的普及	528
冯定传略	531
编 后	547

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 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 进行斗争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领导思想，最基本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思想；这种思想，无论是分析问题或了解事物的本质，无论是规定战略、策略以及每个具体的政策，无论是组织革命的队伍或指挥革命的战斗，都没有不是既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或原则，又合于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思想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性与深刻性，在中国工人阶级不仅和农民、小资产阶级而且也 and 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关系中，也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来说，不论何时何地，彼此的性格总是共同的。但同是资产阶级，在初期与在后期是有区别的；同是在后期，在资本主义国家与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有区别的；同是在殖

- 此文最初发表于1952年8月24日上海《解放日报》，题为《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同年4月《学习》杂志编辑部对此文作了个别地方的修改，以《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为题目，转载在该刊第4期上；《人民日报》也在这一年的4月10日转载；人民出版社出了单行本；接着又收进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出版的《有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问题》（冯定著）一书。这里选用的是此文最后修订稿。

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革命胜利前与在革命胜利后是有区别的；此外，各种类型的资产阶级，也同样在其共同的性格中又各有其特殊的性格。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思想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既从一般的资产阶级方面掌握其共同性，又从中国的资产阶级方面掌握其特殊性，所以认识是异常透彻的，因而当争取其加入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时候，当为了团结而必须进行批评或斗争的时候，都是异常正确的。

资产阶级是以血污起家

同时也有其历史光荣的

资产阶级对于利润贪得无厌，这是大家知道的。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特别是被一小撮百万富翁所操纵而形成寡头专政的国家里，资产阶级，特别是独占资本家——包括财政大亨、军火商人、战争贩子等等——为了能够获得骇人听闻的、超额的、大量的利润，没有不是利用国家这个机器，对内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及广大的劳动人民，对外制造和发动最残酷的战争，来争夺殖民地，来对殖民地实行侵略。他们从经济侵略、文化侵略一直到赤裸裸的武装侵略，直接地或间接地统治殖民地，无穷尽地剥削和压迫殖民地的亿万人民。当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业已蓬勃发展而不可遏止的今天，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英、法等帝国主义，仍坚持要用飞机、大炮甚至毒气、细菌等等东西来巩固其对殖民地的统治，甚至妄想来重新征服已经解放了的民族和国家。他们满口说的是“正义”、“人道”，而浑身沾的都是殖民地和其他民族、国家里男女老少的鲜血。他们的滔天大罪，简直没有言语可以表达。这也是大家知道

的——不但知道，而且正是我们大家领受够了的。但是除此以外，我们必须还要知道：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当其起家的时候，原来就是极不干净的。资产阶级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中，随着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变，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渐发展，一面与日俱增地将原来从事手工业或农业的劳动人民沦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并对他们进行毫无人道的剥削，一面广泛地探索殖民地。他们带着大炮和商品，向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进军，只要能够进去的，便肆无忌惮地进去；一开始就对殖民地的人民进行欺诈、迫害、镇压、屠杀，实际上是毫无代价地掠夺了和抢劫了殖民地人民的众多财富，其强暴与野蛮是史无前例的，也是没有言语可以表达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经说：“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在人类的编年史中的。”（见郭王译本，卷1，904页）又说：“资本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同书卷1，961页）这些话丝毫也没有过分。

我们这里必须再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的一段话，因为这段话描写初期资产阶级是非常淋漓尽致的，这段话说：“资产阶级在凡是它已达到统治的地方，都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淳朴的关系一一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把人们系缚于其‘天然尊长’的复杂封建羁绊，它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条条的利害[·]关系之外，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出什么别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发的宗教虔诚，义侠血性和俗人温情一概淹没在利己主义[·]计较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资格变成了交换价值，它把无数特许和几经挣得的自由都用一个没心肝的贸易自由来代替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无耻直截残酷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素被尊崇景仰

的职业上面的神圣光彩。它把医生、律师、牧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拿钱雇佣的仆役。资产阶级撕破了家庭关系上面所笼罩着的温情脉脉的纱幕，并把这种关系化成了单纯金钱的关系。”（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36页，着重点原来没有的。）

然而资产阶级在其发生与发展的时期，虽用卑鄙龌龊强暴野蛮的手段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可是终究因此也就“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见《共产党宣言》25页）。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既骂了它，也赞了它，认为“资产阶级占得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而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先前一切世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宏伟众多。”（见38页）新兴的资产阶级，对内摧毁了封建制度的统治，对外成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16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17世纪英吉利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18世纪末（1789年）法兰西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西欧主要诸国的资产阶级都掌握了政权，因而开辟了使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道路。自1789年的法兰西资产阶级革命至1870—1871年间的普法战争，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在西欧与美洲业已胜利与确定的时期，资产阶级在这个时期里，不管为了追求不知餍足的利润是多么不够“文明”、多么无耻透顶，然而在政治上终究还是具有革命性的，而且能够起领导的作用。

资本主义世界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

渐趋淡薄与丧失而走向反革命

资产阶级当其尚能领导革命的时候，不管实质上只是为着资产阶级的利益，总是冒充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去反对封建贵族和

僧侣们的，总是冒充代表整个民族的利益去反对外来的侵略和压迫的。然而当人民觉悟起来争取自己的真正利益和要求的时候，特别是当工人阶级成立了工会、并建立了自己的政党、为着自身的利益和要求来进行斗争的时候，它的革命性就愈来愈淡薄，思想上也就不再进步而趋反动了，就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吧，也不愿尊崇、不敢提倡了，而回到唯心主义与僧侣主义的“茅坑”里去了。它宁愿勾结或投降封建君主和地主阶级，而不愿和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在一起将革命干下去，至于整个的民族利益也日益置之脑后了。列宁在1918年7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莫斯科工厂委员会与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词中曾经说：“我们往常说过了，——而多次的革命也恰好证实这点，——就是每当事情涉及剥削者们权力、经济权力的基础的时候，涉及他们的所有制的时候，这种所有制是使数千万计的工人与农民的劳动归他们支配的，是使地主们和资本家们有实行压榨的可能的，——重说一遍，就是每当事情涉及资本家们和地主们的私有财产制的时候，他们也就忘记所有自己关于爱祖国爱独立的语句了。……每当事情触到阶级利润，资产阶级也就出卖祖国并与随便什么的外国人进行买卖勾当来反对本国的人民了。这个真理，俄国的革命历史再次三番地说明了，正象百余年来革命历史给我们说明了似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与阶级政策的法则，在一切时代里，在一切国家里，就是如此。”（译自《列宁全集》第28卷第9页）

百余年来的历史，确是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由革命到反革命的丑恶演变。资产阶级在1789年的法兰西革命中，革命的精神算是非常饱满的，可是1848年普鲁士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就已没有1789年法兰西资产阶级那样生龙活虎了，而为了镇压工人阶级就

已经开始和反动的贵族去进行妥协。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阶级的起义与巴黎公社的成立，标志着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的丧失和结束。巴黎资产阶级在公社成立前的围城中曾大发国难财，并且正当人民挨苦受难奋起卫国的时候还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资产阶级的政府不许工人成立军队，反而和敌人订立了屈辱的和约，为的就是当公社一经成立，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将军就进兵来对公社实行血洗。可是巴黎公社虽被资产阶级的反动武装摧毁了，终究还是历史上工人阶级第一次给予资产阶级以严重的打击，资产阶级因此愈益胆怯起来。嗣后如在奥匈，在俄国，在日本及其他各国，那里的资产阶级因为形成为阶级比较更晚，所以反动性愈益暴露，干脆就向君主和贵族叩头屈膝了。

19世纪末叶，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帝国主义的阶段，也就是列宁说的到了“垂死的”阶段。在那里的资产阶级不但完全丧失了革命性，而且成为革命的对象了。正象列宁说的：“在技术十分发达、文化丰富和宪法周备的文明先进的欧洲，已经到来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发号施令的资产阶级，因惧怕日益增长和日益强大的无产阶级，便支持一切落后的、衰亡的、中世纪的东西。日益衰亡的资产阶级，同一切已归衰亡和正在衰亡的势力联合起来，以图保存正在动摇的雇佣奴隶制度。在先进的欧洲发号施令的是支持一切落后东西的资产阶级。欧洲在今天之所以是先进的，并不是由于资产阶级，而是违反资产阶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使那争取美妙的未来的百万大军日益增大起来，只有无产阶级才保存和传播对落后、对野蛮、对特权、对奴隶制度、对人侮辱人的无情仇恨。”（《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2—43页，着重点原来就有的）总而言之，从人类整个世界范围与全部历史发展

来说，资产阶级革命的旧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已经“呼之欲出”了。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资产阶级 则还有一定的革命作用

当整个世界已经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资本主义先进国家里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为革命对象的时候，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倒还“余勇可贾”。这是因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来说，帝国主义国家是决不允许其也象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来发展资本主义，而为了间接地与直接地控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命脉，除了实行直接的武装侵略、经济侵略、文化侵略外，总是尽一切可能地培养与扶助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一切根深柢固的封建反动势力，因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资产阶级，在其形成的过程中，深切地感觉着窒息的痛苦，就是和封建君主、军阀、官僚、地主阶级妥协起来，仅仅希望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也极少可能。这样也就使得“……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实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见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同上书，第26页），而这个“资产阶级还与人民一同反对反动势力”。（见列宁：《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同上书，第43页）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民族资产阶级，不管其本身怎样软弱，也就这样显示了“后来居上”的样子，演奏出资产阶级在革命事业中的“尾声”。

列宁与斯大林都曾一再地评价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对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意义。列宁很注意中国孙中山先生领

导的辛亥革命，在指出孙中山先生“谈得如此漂亮而又如此模糊的‘经济革命’”的同时，曾誉孙中山“是充满着这样一个阶级所固有的高尚精神与英雄气概”的。（均见同上书《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一文）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在国际和国内的情况和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从国际来说，这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已经真正开始了；从国内来说，这就是比资产阶级更强大更坚决的领导革命的阶级业已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了。国际国内这些新的情况和条件，决定了中国社会就是在革命胜利后也不可能走向资本主义，而必须走向社会主义。正象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所分析的，“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孙中山先生在这种新的情况和新的条件中并不是倒退了一步，而是前进了一步，这正是其非常伟大的地方；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论》）

新三民主义在实行推翻帝国主义与反动势力统治的斗争中，基本上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纲领相接近的。所以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帮助国民党改组，使之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

的革命联盟，是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思想的，毛泽东同志那时虽尚未居在领导地位，但在这次大会上也正是坚持了这个正确意见的。

中国资产阶级在 1927 年的 革命紧急关头动摇叛变

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思想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正象对其他任何事物的认识一样，从来不是表面的、片面的、机械的，而是能够通过现象、全面地掌握其本质的，所以即使当资产阶级正在和人民合作的时候，也能够看出它的反动尾巴。我们今天读了毛泽东同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篇文章以后，就可知早在 1926 年 3 月间，毛泽东同志关于资产阶级在革命脸孔掩饰下的反动尾巴，就已经发出警号了。这个警号的发出，不仅是因为当时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而国民党的领导权已落在野心家蒋介石的手里，而且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认识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而来的。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撇开了买办阶级，认为这完全是帝国主义的附庸，然后论及中产阶级说：“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又说：“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

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毛泽东同志不但对资产阶级的右翼发出了警号，而且对资产阶级的左翼也发出了“提防”的警号。这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所以在国际国内新的情况和条件下还在参加革命，主要的是想利用业已过去了的、腐朽了的“革命老牌子”，来夺取革命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的夺取，为的并不是使革命贯彻到底，而是使革命当已经相当地满足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时候，能够“适可而止”，或者是事实上决不可能“适可而止”的时候，多少可以有些资本去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讨价还价，而实行对革命的叛变。

毛泽东同志这种灼知与卓见，恰巧和当时的陈独秀机会主义相反。陈独秀机会主义只看见中国资产阶级进步的一面，没有警惕其反动的一面，所以当资产阶级既震慑于人民力量的风起云涌而又受革命敌人威迫利诱因而表示动摇的时候，不是对资产阶级进行批评和斗争，而是完全对资产阶级表示迁就，结果并不是争取了资产阶级，而是促进了资产阶级对人民的疯狂进攻与对革命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妥协投降。

中国1924年至1927年间的革命，终于遭受失败了。这个失败的原因：从革命的敌人来说，其力量是比较强大的，因为国际帝国主义不但始终扶持着中国的封建军阀、官僚、地主等一切最反动的势力，而且还亲自出头露面，动起手来，横加干涉。但不管敌人怎样强大，假使革命阵营内没有资产阶级的动摇，没有蒋介石集团的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相互勾搭而实行叛变，形成反革命对革命的里应外合，那么革命也许不会失败，失败了也决不如此惨重。1924年至1927年间的革命是失败了，幸亏中国共产党内已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领导思想的存在，并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

领导下重新组织了革命的力量，建立了革命的武装，乃至创造了革命的根据地，革命终于又向上高涨起来。不然，中国革命的胜利，也许更要推迟到不知什么年月了。

中国的民族危机迫使资产阶级

又复“败子回头”

中国革命的道路不管怎样迂回曲折，可是辩证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思想却永远象灯塔一样给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指示着明确的方向。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变而失败了，蒋介石集团向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妥协投降的结果，自己很快就达到了大资产阶级的地位，也就是发展而成为官僚资产阶级了，这时它不但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且也再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了。蒋介石集团从此变成了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变成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对民族资产阶级来说，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也一无所获，而其经济上所感觉的窒息，也不是放松而是加紧了。因此，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以后，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领导思想又和“左”倾机会主义者不同，毛泽东同志在其一手创造起来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的时候，从来就不主张对城市中小工商业者与农村的富农采取过“左”的政策。特别是当1931年9月18日的事变以后，中国的民族危机又复深重起来，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领导，掌握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就预见到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还是能够将资产阶级争取过来而发扬其革命的一面和抑制其反动的一面的。

然而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正确领导思想，在估计整个资产阶级的同时，对于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又各有不同的看法。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篇文章里说：“……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我们暂且不去估计他们的变化的可能性。问题是在没有那些关系或者关系较少的那些部分。我们认为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着重点原来没有的，下面凡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都是如此）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样的分析和判断是何等卓绝与英明！

上述这篇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是在1935年12月27日发表的，那时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已经开始确立起来。其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猖獗，中国的亡国惨祸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根据正确领导思想而决定的政策与策略，不但争取了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一致抗日的主张下，由于广大人民抗日运动的声势日益浩大与壮阔，也使部分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不得不被迫而同意抗日，这是因为正象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抗日时期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本小册子里所说的：“……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